

薛涛诗意考辨

张洁云

内容提要 《筹边楼》为歌颂李德裕治边新策;《题竹郎庙》为怀旧好之作,随文辨证了竹郎、竹王、夜郎王的混同始于《后汉书》;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两首分别写于行前和到后,意在求赦;《罚赴边上武相公》两首为不同内容的诗篇,前人辑涛诗误合为一;《赠远》两首乃薛涛于同年暮春、仲秋先后寄“夫”,表达情意所吟。

关键词 启戎资益 竹郎·竹王·夜郎王 吐蕃、南诏、回纥联军入侵 山水屏凤 秦关

一、《筹边楼》

平临云鸟八窗秋,壮压西川四十州。诸将莫贪羌族马,最高层处见边头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曾慨叹前人很少注意薛涛这首《筹边楼》诗。馆臣还高度评价它,云:“其托意深远,有鲁嫫不恤纬,漆室女坐啸之思,非寻常裙屐所及,宜其名重一时。”这说明他们认为诗的主旨是“止战”。明朝钟惺谈此诗的撰作时,云:“教戒诸将,何等心眼!洪度岂直一女子哉,固一代之雄也!”这也是认定薛涛系借楼题诗,批评将领们为贪求战利品而启边衅。笔者觉得这些评说,同薛涛为歌颂李德裕治边政策而写此诗的本旨似不完全切合。

馆臣与钟惺的观点,表同而实不同。钟惺显然受杨慎评薛涛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诗的影响,采取讽谕说。而馆臣所云,“鲁嫫”典故出自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:“嫫不恤纬,但忧宗周之殒”。“漆室女”典故出自《列女传·鲁漆室女》,说鲁穆公时代,有少女忧君老太子幼,叹国事艰危而倚楹悲歌。两者都是指的心忧国事,同讽谕将领全无关涉。但是,无论是讽谕说,或者是忧国说,都不大合于薛涛撰写此诗的背景,也难以解释首二句对筹边楼雄姿的描绘。

钟惺和四库馆臣似乎都是着眼于“诸将莫贪羌族马,最高层处见边头”二句。可是,恰好正是这两句,说明了全诗题旨在于歌颂李德裕的治边政策。

李德裕镇西川,对困扰西川的吐蕃、南诏联军入侵,采取了新的战备措施,即防堵吐蕃于松、维、威、茂四州以西,反击南诏于大小凉山区域,并直驱入滇,从南诏都城解救回被掳去的成都民众。这些事迹,在两《唐书》和《会昌一品集》里都有详细记叙。《藏书·经世名臣·李德裕》所记较为简明集中,现摘引如下:“始韦皋招来南诏,复嶲州,倾内资,结蛮好,示以战阵文法。德裕以皋启戎资益,其策非是。至元颖时,遇隙而发,致长驱深入,蹂剔千里,荡无孑遗。今痍痕尚新,非痛痒

革,不能刷一方耻,乃建筹边楼。”接着,它说楼上左壁画南通云南的山川险要,右壁画与吐蕃相接的地区以及两条线路上筑垒建城设防的所在,并且随地记明敌方的兵力配置及战力的估测。他还向外区购置精良武器,大练蜀军,以防备敌军再次入侵。吐蕃、南诏听到消息之后,十分畏惧,不是示好,就是投降。可见,李德裕按时代背景的变化,对韦皋启戎资益政策作了必要的改变,收益是相当大的。

不过,韦皋当年实施启戎资益的治边政策,也自有其必要。就那时的情况看,这未必不是解决唐王朝蜀陇边患的首策。天宝战乱,引致吐蕃联合南诏、回纥联军入侵。贞元年间,未皋镇蜀,凭其军事才能和善于统率将领,大破吐蕃于松维一带,西川稍安。他为获得边境的安定,采用启戎资益政策,允许除吐蕃之外的民族到西川进行商贸活动,交流工艺文化,借以联络南诏等民族。可是,韦皋的继任者多不具有他的军事才能,尤其是杜元颖、郭钊一类庸才造成的种种失误,导致了南诏的入侵。大和三年秋天,南诏从大理起兵,秋风扫落叶般地攻抵成都,掳走民众、民工成千上万。在这次战争中,薛涛也曾身受其祸(战乱情况,她的诗友雍陶曾写有多首诗篇反映)。因此,薛涛对李德裕改弦更张、废弃启戎资益为严备设防的政策,从内心予以赞同并加以歌颂。

基于以上论述,我认为“诸将莫贪羌族马”二句应从汉朝的开边政策和韦皋的启戎资益政策去求得解释,以之劝告西川诸将,勿因取得边贸利益而忽视备边,或勿因取得战利品而轻启边战。这样解释,也才切合歌颂李德裕治边政策(即建筹边楼规划战备及购械练兵等措施)的诗旨。

二、《题竹郎庙》

竹郎庙前多古木,夕阳沉沉山更绿。何处江村有笛声,声声尽是迎郎曲。

关于此诗的旨意,由于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把竹郎同夜郎王混一,《蜀中名胜记》也说唐蒙斩竹王,土人不忘其本,建立竹王庙祭祀,所以有论者解说此诗是颂神的,甚至认为薛涛是记述民众怀念夜郎王的。

竹郎、竹王、夜郎王的混同,乃是古代人把民间传说神话化,并用来神化王族、贵族的祖上。这也是民族图腾崇拜的遗存。《华阳国志》、《蜀中名胜记》的记叙,就十分明显。前者说:“有竹王者,兴于遁水。有一女子浣于水滨,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,推之不肯去。闻有儿声,取持归,破之,得一男儿。长养,有才武,遂雄夷濮……”该书又称竹王作竹王三郎。后者引《志》(似是指书的前面所说的《本志》)说,荣州“邑东荣川即古遁水,河岸有竹王祠,盖以祀夜郎王者”,并引《蜀记》:“昔有女子于溪浣纱,有大竹流水上,触之有孕,后生一子,以竹为姓……”遁水,就是源出滇南,流经黔西南入桂北的北盘江。荣州“旧志”说荣川是古遁水,显然是因江岸有竹郎庙而加以附会。不过,通过《华阳国志》和《蜀中名胜记》,足以看出竹郎传说和竹郎(王)庙,从广西到四川都有存在。

事实上,竹郎庙还远不止存在于遁水、荣川的江岸。刘琳教授《华阳国志校注》关于竹王三郎的几条注文中,曾引述1944年6月号《旅行杂志》文章,原作者说他在调查研究竹郎传说的行程中,发现桂、滇、黔、川、鄂五省,多达数十地有此传说和祠庙。作者认为在各种有关竹郎的传说中,以仍流传在滇桂交界处的白彝传说为最古老,那儿就是遁水——北盘江流域。这传说属于祖先神话,大意是:汉江上漂浮一节竺竹筒,流到岸边爆裂,迸出男青年阿槎,在山洞中栖身。有天,他上麻达坡猎取食物,在一梨树下遇着一狗形母猴,两相交合而衍生出后代。再就四川说,现在所知的

竹(王)遗迹至少有五处:即上述荣川岸,还有乐山的青衣江岸(《蜀记》)、大邑(《太平寰宇记》)、邛崃(《元丰九域志》)以及成都的竹王山(近年来报刊上改作“竹旺”、“竹望”等)。

根据上述各种资料,可以看出竹郎(王)传说,并不存在于古代夜郎族生活地区,乃是在彝、濮、僚等族地区。遁水更不流经古夜郎国境,两地相距达数百里。四川荣县、邛崃、大邑、乐山和成都五处有竹郎庙和竹王山,更与夜郎族毫无关系,反倒是成都人司马相如同夜郎王被杀有关。但是,有关记载司马相如宣抚西南夷的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各纪、传,并无竹王的传说,也就没有把夜郎王和竹王混一的事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也没有说夜郎王和竹王是同一人,而是分别叙述的。所以,混同夜郎王和竹王的乃是《后汉书》。

再者,“夜郎自大”这一贬义成语,已存在两千余年,纵使夜郎族要纪念他们那位被司马相如、唐蒙斩杀的先王,那汉、彝、僚、濮族怎么会随同夜郎族一起立庙祭祀呢?因此,竹王当是竹郎的王族化,再被傅会作夜郎王的。

辨明竹郎、竹王不是夜郎王,而是繁衍后代所依凭的男青年,才能让薛涛《题竹郎庙》脱掉颂神的外加盖头,露出它的本来面目。即薛涛在竹郎庙前面对夕阳古木,闻江村笛声,引发了对离别已久的某人的强烈思念。由此也可以看出,唐朝人并没有把竹郎庙当作夜郎王庙,它反证了竹郎与夜郎王的混一,未必在民间得到认同。

三、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二首

黠虏犹违命,烽烟真北愁。却教严谴妾,不敢向松州。
闻道边城苦,今来到始知。羞将门下曲,唱与陇头儿。

薛涛的这两首五绝,就诗语考察,不是同时撰作。其一是受谴后将启程去松潘,或行程途中所吟,其二系到达松潘后所写。

古人对薛涛被罚赴边的缘由,很少谈及。似乎只有依凭《十离诗》,说是因薛涛在酒席宴上因醉争令,掷注子误伤韦奉侄儿(或即韦正贯)所致,但又有别的否定说法,令人无从认定。加以对《十离诗》的作者历来就有异说,就更难得知实情了。但是笔者认为从韦庄的《又玄集》选入这组五绝之一的情况来看,或许倒果真同《十离诗》有关。由于《又玄集》选有《犬离主》,从而可以判定《唐摭言》定《十离诗》为“浙东薛书记”上元稹之说不可信,何况元稹“犹子”从他于浙东之事,绝无资料可依。《犬离主》一首,无论在《唐摭言》的《十离诗》里,抑或是在《唐诗纪事》的《五离诗》中,均系组诗的第一首,可见韦庄辑入选集自有其见地。

韦庄《又玄集》古代刻本已佚,清初王士禛辑刻《十种唐诗选》时,只见一卷(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为三卷),1958年中华书局据日本享和三年官版刻本三卷印入《唐人选唐诗(十种)》,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。享和三年(1805)虽不算很早,但其《又玄集》属迄今所见的最古全刻本,集中所收薛陶(注“作涛”)所作的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等,也属迄今所见的最古文本。由于享和刻本所收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和《犬离主》诗,把作者刻作薛陶,并加注“作涛”,故今人有认为《又玄集》收的这两首诗以及别的薛涛集中收入的《五离诗》、《十离诗》、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的另外三首,俱系晚唐另一作者薛陶所撰。既然最早的这两首诗的选本,作者书名薛陶(虽说我国

历代刻本作薛涛),也就有必要“置疑”。笔者下文的论述,暂取日本刻本《又玄集》的“薛陶”“作涛”注以及我国历代刻本的情况,姑且算作是薛涛诗作。

明清人评及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二首,大多持两类意见。一是讽谕说,杨慎云:“有讽谕而不露,得诗人之妙”;郭玮云:“讽刺诗须如此若隐若跃,使人深味,乃得妙旨。”二是哀怨说,钟惺、赵世杰皆以为:“二诗如边城画角,别有一番哀怨。”讽谕说很难理解,薛涛被罚赴边,反敢以讽刺回报,这与她的地位、身份及心情不大符合。再说,讽刺什么?这难以用抨击御边战争去解释,因为薛涛并非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,对于唐王朝防御吐蕃、回纥、南诏联军入侵的设防借施和反击政策,很难设想她会给予讽刺。“黠虏犹违命,烽烟直北愁”,无论怎详解释都难同反战挂上钩,反倒可以看出作者对边警的关切。哀怨说较符合薛涛原意,不过,这也得同她被罚缘由联系起来考察,否则,哀怨仅仅落实在边城生活的困苦上,未免对其思想和品格有所影响。

设若我们联系《十离诗》及《江边》、《送友人》、《赠远》等诗,倒可妄测薛涛被罚赴边,或许同“飞去飞来上锦茵”的“陇西一孤身”(《鸚鵡离笼》)相关连。松州正当西川、陇西联防吐蕃入侵的战区相交接的前哨,故韦皋罚薛涛去那里。另外,从薛涛被罚去松州的短暂时间看(腊月受遣即启程,正月就已回到成都),韦皋意在让她体会一下陇西敌前生活境况,以绝其对某人的眷念,而并不是给予严惩,颇合他一贯对人宽容的性格。

因此,笔者认为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二首所表达的是薛涛对韦皋罚她到松州之意的明白理解,从而献诗以求宽恕。

四、《罚赴边上武相公》二首

萤在荒芜月在天,萤飞岂到月轮边。重光万里应相照,目断云霄信不传。

按辔岭头寒复寒,微风细雨彻心肝。但得放儿归舍去,山水屏风永不看。

关于这两首诗所献对象的问题,研究者大都认为是韦皋而不是武元衡(因薛涛无两度罚边之事,“武”系“韦”之误)。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说,这二诗出于《吟窗杂录》。《吟窗杂录》系托名南宋陈状元的伪书,故涛作之说不可信。然而,伪书里所撰所录的旧事、史实、诗文等,并不都是杜撰伪编,不能全部否定和排斥,而有必要就别的资料和内证进行辨析。对诗文真伪的论定,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考察它本身的文字内容。

从第一首诗的含义来看,似乎不是“罚赴边”而上韦皋(或武元衡)的。首先,“萤在荒芜月在天,萤飞岂到月轮边”,完全不符合薛涛罚赴边的时令。前人记载她被遣时正是腊月,其必经之地威、茂两州和松州已是冰雪满地,怎么会有萤虫飞于荒野间?从全诗看,应是即景生情,以萤、月分别比喻自己和韦皋。“重光万里应相照,目断云霄信不传”,表示对韦皋很敬重,十分殷切地盼望他能改变罚她赴边的主意。但这萤虫飞舞之景,显然与当时季节不符,故定作薛涛罚赴边所吟不大恰当。第二首诗语与第一首迥然相异,它的景色完全合乎薛涛罚赴边的时令,也同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两首的诗意相同,且前后关联。在此,不妨作这样的臆测: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之一,作于将行、初行之际;《罚赴边上武相公》之二是途中所吟;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之二,系到达松州后撰成。

“山水屏风永不看”一句是全诗的关键。“山水屏风”典出盛唐年间,距薛涛时代不远,研究家

们已注及,此处不再重复,只征引《唐书》,再予说明。从唐玄宗接受宋璟的谏诤,立《书·无逸》篇戒骄侈,到改立“山水屏风”一事,可看出他“志欲既满,侈心乃生”。可见,此诗语是薛涛自责骄侈而发,还可能是被罚赴边的缘由之一。

五、《赠远》二首

扰弱新蒲叶又齐,春深花发塞前溪。知君未转秦关骑,日照千门掩袖啼。
芙蓉新落蜀山秋,锦字开缄到是愁。闺阁不知戎马事,月高还上望夫楼。

现今的薛涛研究者,普遍重视这两首七绝,因为它们是现存薛涛诗中唯一被明称为“夫”的诗篇。

《赠远》提及的“夫”究竟指谁,归纳起来,大致有三种说法:(一)持旧说者依《云溪友议》,肯定薛涛“夫”为元稹。这里,姑且不管北宋时期就有论者指出过《云溪友议》的错误,以及今人陈寅恪、卞孝萱等学者直接间接的否定论断,就是持此说的研究者的解说,也存在一些问题。如用元稹作江陵府士曹参军去证实“夫”为军人,把江陵府与秦关混一等就难以令人信服。(二)“夫”为郑纲说,属于创新,难能可贵。不过,这一新说的先决条件应是:1、证实郑纲何年被唐王朝任命为资州刺史;2、证实韦皋曾派遣管民事的资州刺史率不属其统领的汉安军,应陇西地区节度使之请去援助陇西;3、证实郑纲战死陇西前线,何以不见于史籍和其它资料所录的“死国事”将领、地方大员的名单内;4、证实作为郑纲夫人,在郑纲殉职后应受朝庭优抚的薛涛,是否得到过应有的封赠等等。(三)未落实在具体人的“夫”说。

我认为,学术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,后者允许虚构,前者则容不得半点不实的材料。所以,有关薛涛的小说戏剧等,完全可以说与元稹、田洙等有关,但对于薛涛身世的学术研究,却不可随意编造事实和人物。《赠远》本身只能说明,薛涛称为“夫”的那人是她两次寄诗时正服役于陇西前线的军事人员,不能说是元稹,因为元稹生平经历没有服役陇西事;也不能说是郑纲,因为他服役于陇西的诸多事实,尚未求得实证。

《赠远》二首,应是在前后不同的时间里,两次写与“夫”的。就薛涛集内的一些组诗来看,既有同一时间写成的,也有不同时间写作、后经结集者(含传抄者)合成的。前者如《十离诗》、《上川主武元衡相国》等,后者如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、《赠远》等。

从《赠远》的诗语考察,第一首的时间应为春天。其时菖蒲新叶已长出,浣花溪畔繁花似锦。据气候学家说,成都平原自盛唐起气温变暖,因此可能是在二三月间。此时,薛涛得知远在秦关前方的“夫”的讯息(是信或是传话,不得而知),写此诗以表达思念和愁苦的情怀。秦关即陇西,是防备吐蕃、南诏、回纥联军的中心地区,在现在的天水 and 临洮一带。由于古代交通的不便及其它原因,“夫”回信已是“芙蓉新落蜀山秋”之时。于是薛涛再去信,说“闺阁不知戎马事,月高还上望夫楼”,表达无限惆怅和思念之情。从这两句诗语看,可推知其“夫”在回信中谈到了没有回来或没有脱离前敌、内调别地的原因,才使作者“锦字开缄到是愁”,只有在明月当空的夜晚,独自登上“望夫楼”,以寄托无边的思念。

不过,《赠远》二诗究竟写于何年的春秋,其“夫”哪年哪月与薛涛在何地结为夫妻,他年长于她或年少于她,都无从知晓,尚待人们进一步的研究。